

我眼中的《中国财政》

□ 高培勇

中国财政杂志社已到而立之年。30年前，在杂志社成立之时，我还在天津财经学院读书。那个时候，财经领域的报刊数量屈指可数，远不似今天这么多。作为一个以宣传党和国家财政经济政策为主旨的新闻平台，《中国财政》杂志就像一块儿巨大的磁铁，深深地吸引着包括我在内的高校财经领域的师生们。

在我的印象中，中国财政领域的诸多改革事项或事件，都是由《中国财政》对外发布并阐释的。诸多影响中国财政走势与决策的重要讨论，也都是由《中国财政》发起并组织的。《中国财政》以其独特的视角、大量的资讯、财经热点的准确把握、焦点问题的深度剖析等特色，成为国内颇具影响力的一份财经报刊，也成为我学生时代常年相伴的良师益友。

后来，随着我完成学业、进入财经教学和科研领域，我开始尝试着给《中国财政》写东西。当《中国财政》采用我的第一篇投稿，自己的那份欣喜和周围同事们的那份羡慕情景，在今天仍能历历在目。在这个平台上，我逐步得到锻炼，逐渐建立自信，也收获着以自己的研究成果报效祖国和人民的那份成就之感。

在当今经济信息庞杂、各种财经出版物群雄逐鹿的时代，在《中国财政》身上，我可以感觉到一种立足中国实际、直面现实、理性思维、探究真相的精神，一种在纷繁复杂的经济现象中敏锐捕捉焦点热点问题，探寻中国财经发展道路的明确定位，一种牵挂民族、心系发展、关注民生的使命与责任。我以为，作为一个财经媒体，具有这样的良知、责任和见识，既难能可贵，更令人敬佩。

衷心希望《中国财政》坚守自己的风格与特色，为读者提供更广泛、更深入、更有影响力的文章和财政资讯，继续扮演好中国财政改革与发展的有力推动者角色。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财政与贸易经济研究所所长）

《中国财政》： 更借东风破浪行

——写在《中国财政》杂志社
成立30年之际

□ 齐守印

我以这个题目来写纪念中国财政杂志社成立30周年的文章，包括三层涵义。一是《中国财政》作为国家财政部创立和主管的工作研究和经验交流性重要刊物，是借着我国改革开放的东风扬帆起航、一路前行的，她不仅历史地见证着30年来中国财政改革发展实践而且一直与之互动共进着，堪称功不可没。然而，财政改革的航船尚未到达期望的彼岸，仍需《中国财政》东风劲吹催征程。二是《中国财政》作为全国财政人的工作之友和学习园地，像东风一样始终助力着包括河北在内的各级各地财政改革发展的伟大事业，促使公共财政一朵又一朵改革创新之花灿烂绽放。三是作为一个热心读者与作者，我的学财、研财、理财历程深得《中国财政》这股东风之益——通过学习刊物所载工作研究和经验交流性文章，使我能够及时而广泛地了解全国各地各层级财政管理和财政改革方面的经验与动态，因而帮助我不仅实现了从一个单纯的财政理论研究工作到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财政工作者的转变，而且为我在财政领导工作岗位上研究谋划和组织推动本省财政改革创新提供了很多借鉴和启迪；刊物通过登载我们的文章或记者访谈对我省财政

改革创新成果加以肯定,更像张帆的航船得到东风鼓舞一样破浪前进。正因为如此,我与《中国财政》和辛勤奉献于其中的各位领导和同志们结下了不解之缘和深情厚谊。

据不完全统计,自上世纪90年代初以来,《中国财政》已经发表过我20余篇文章。其中,有一些文章反映了我对贯彻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积极正确发挥财政职能作用促进经济社会科学发展的思考,如《按照“三个代表”的要求创新理财思路》(2000年第9期)、《以科学发展观指导财政实践》(2004年第6期)、《发挥财政职能促进构建和谐社会》(2005年第9期)、《积极正确发挥财政职能作用促进经济发展方式加快转变》(2010年第22期)等;更多的文章是我伴随实践发展从理论角度研究探讨财政改革与管理方面问题的认识结晶,如发表的《进一步深化支出管理改革》(1997年第4期)、《推进财政制度创新加强廉政建设》(2001年第7期)、《完善机制确保财政运行安全规范有效》(2004年第11期)、《在改革中不断推进财政科学化精细化管理》(2009年第14期)、《构建现代公共财政体系面临的主要任务》(2010年第12期)等;还有一部分文章则直接反映了河北财政改革创新的实践探索,如《河北积极探索规范的转移支付办法》(1996年第3期)、《积极探索建立预算管理新模式》(1999年第8期)、《在力促科学发展中不断推进公共财政体系建设》(2007年第10期)和《理论与实践互动 体制与管理并重》

(2008年第15期)等。所有这些文章确凿无疑地记忆和见证着分税制以来我们河北财政系统以公共财政理论为基本取向的各项改革创新的轨迹——从规范政府间转移支付、竞争性政府采购到部门综合预算、零基预算、绩效预算管理、中期滚动预算、创新财政监督机制,再到系统地构建地方现代公共财政体系,每一步都是理论与实践互动的结果,从而体现了改革创新的自觉性和积极进取的主动性。

除了上述那些内容比较严肃的文章外,近年来,《中国财政》也发表过我写的算作是较为轻松的、财政文学一类的东西,如《财神的见闻与遐想》(2009年第17期)和《公共理财之歌》(2011年第6期)。前者的标题本来是第三人称的“关于财神的见闻与遐想”,不知道为什么发表出来却变成了第一人称,咋看到不由得一愣,转念一想,觉得倒也很有意思——我竟俨然自命不凡地成了“财神”!后者则试图以歌词方式表现公共财政的本质和为民理财、为国奉献、追求科学、探索创新的财政人精神。我深深地以为,为国家和人民担负理财重任的全国财政大军理应有一支能够深刻揭示公共财政根本属性、反映我们的职业高尚性、体现我们改革创新自豪感、优美而又豪迈的进行曲,以对外展示并自我增益我们财政人一心一意忧国忧民、为国为民、强国富民、开拓进取的高尚情操。

令人难忘的是,我的研究写作很早就得到《中国财政》杂志社领导和编辑们的热情鼓励。早在1992年,中国

财政杂志社主编的《通讯参考》(第4期)就曾刊发了我写的题为《关于财经研究与写作的几个有关问题》的文章,其编者按说:“本期刊登了河北省财政科研所所长齐守印和湖北省襄樊市樊西区财政局副局长马善记两位同志的文章。我们认为,这两篇文章值得一读,对于我们财政部门的同志搞好财经文章的写作会有很大启发和帮助。”时隔两年,即我国刚刚实行分税制财政体制的1994年,我在《财政》第4期发表了我撰写的《试论分税制方案的政策导向》一文,记得刘凤桐副总编当即就给予高度评价,次年又被杂志社评为“好文章”并颁发荣誉证书。我体会,杂志社的鼓励在很大程度上确实是我们这些人长期结合实践进行理论和工作研究的一个外在动力之源。

屈指算来,从上世纪80年代中期的“六五”到如今“十二五”开局之年,作为中国财政工作者良师益友的《中国财政》已经伴我走过近30个春秋。一路走来,她对于我实现从学财、研财到亲身理财的一步步转变而言堪称受益匪浅。这期间,虽然社长、总编、副主编、编辑部和其他职能处室的同志几经更替,但他(她)们诚实热情的待人态度、严肃认真的工作精神、可亲可爱的音容笑貌一直留存在我的心中和脑际;他(她)们给予的无私帮助,永远值得我铭记与感恩。

翱翔卅年虽高远,鹏程万里尚需行。衷心祝愿《中国财政》在实现中国公共财政体系现代化的新征程中东风再鼓更破浪、张帆直航渡远洋!☞

(作者为河北省财政厅厅长)